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建构策略研究

◎ 刘立华 童可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征,是国家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是当下中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有关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建构资源和路径进行了梳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注重中国具体的话语实践,另一方面,要打破学科边界,培养话语和跨文化研究的人才,提升国家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关键词: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内涵 建构 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2-0136-11

作者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44

Title: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Discours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ith a review of discourse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content, method, construction resources and route of Chinese discourse. It is argued that Chinese discourse, one indispensable part of social practice in modern China,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and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dis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specific discourse practices of modern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to cultivate the talent in discourse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and to improve the nation's discourse competence on the other.

Keywords: Chinese discours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Author: Lihua Liu, Professor, Schoo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Ke Tong, Schoo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西文化的互动和碰撞将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作为社会互动主要形式的话语互动,无疑是观察社会实践,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同时,话语沟通也是有效解决由于国内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各种矛盾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新的时代,我国新的社会实践也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表征,同时也应该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和资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民族独立、国家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过程中,在特定历史阶段提出的鲜明政治话语,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新阶段睿智的政治话语范式的转换。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国内、国际沟通互动的需要,其本质是一种意义的生产、流转与传播模式。本研究中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侧重作为话语主体的中国与世界的沟通过程中形成的话语范式和模式。在这一视角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西方守成国家之间的意义沟通实践,是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话语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过程。

一、话语的学科渊源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话语”这一概念密切相关。“话语”概念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后来逐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米尔斯曾经从语言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以福柯著作中所涉及的话语理论为基础,总结了三种类型的话语研究,其中包括话语研究的语言学流派、社会心理学派和批评话语学派^[1]。语言学流派关注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社会心理学派在关注大于句子单位的语言单位的同时,也关注后结构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例如权力关系和知识的产生等^[2];批评话语分析学派则关注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等问题。

在福柯思想的影响下,话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扩展,话语被界定为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话语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在建构社会现实和身份^[3]。基于话语的社会建构实践属性,话语是一种空间,也是人们理解物质世界,并赋予物质世界以意义,进而把物质世界表征化的一种方式。据此,话语则被界定为是构成主体和客体身份的有意义的实践系统(Howarth and Stavrakakis 3)。话语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塑造了客体,从而限制了相对于该客体的行动的可能性(Epstein 14-15)。

话语与社会互为建构的属性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其代表人物拉克劳(E. Laclau)和墨菲(C. Mouffe)所讲的“话语”与福柯的“话语”在英语中使用同一个词,但却存在巨大的差异。福柯的“话语”,是指“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是一个陈述的分散系统。话语结构不是和陈述处于同一水平,话语结构只是对不规则的陈述分布

进行规则化。拉克劳和墨菲则把那些能够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为“接合”(articulation),在这一“接合”过程中,各要素的身份得到修复,这种由于“接合”实践而构成的结构性总体就是“话语”(Laclau and Mouffe 105)。正是因为“接合”概念,拉克劳指出:“墨菲与我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所描述的话语概念与福柯提出的话语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建立在我们都抵制的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区别上的。”(转引自巴特勒等 94)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话语”既是解构主义的某种产物,同时也肩负着政治本体论的使命。拉克劳认为,话语理论超越了传统哲学的解释模式,话语是由言谈与行动、语言与使用语言的语境构成的总体,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构造概念。拉克劳曾经用具体的例子来解释其“话语”概念的意义。他举例甲乙二人砌墙,甲向乙索取一块砖,然后砌在墙上。第一个事实是要砖,属于语言学;第二个事实是砌砖,属于由言语而引发的行为。尽管两者在术语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但是两个事实构成一个时间的整体,拉克劳指出,这一自身既包括语言,又包括非语言的总体性就是话语(Laclau 100)。因此,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并不局限于语言学范畴,而是超越语言学领域,即语言及其行为仅仅是组成“话语”的一个部分。在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任何话语实践都是在试图统治话语场域、控制差异流动或是在建构一个中心,霸权则是通过话语扩张而使意义被部分固定的道德、政治和知识的领导权,在这种过程中,话语涉及的各方的身份得到建构或是修正(Laclau and Mouffe 105)。

从以上研究来看,国外话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经过近二十年迅速发展,涉及领域也越来越多^[4]。国内话语研究则主要关注话语的建构属性及由此所产生的国家民族或是族群的身份建构问题。“话语”之所以较之“语言”得到高频使用,是因为社会语言学家不满足只靠分析语言来判断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意图,而是热衷于摆脱这种“语言反映”论的束缚进入“话语建构”论的领地(田海龙 32)。同时,国内话语类型研究也越来越精细,商务话语、媒体话语、政治话语、移民话语、环境话语、能源话语、危机话语等研究逐步发展起来。但国内的研究基本是介绍国外理论或是运用国外的分析框架,模仿多,本土研究和创新转化少。话语研究中语言描写过多,宏观的社会实践挖掘不足。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作为一个诞生于中国本土的概念,虽然已经连续召开了四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研讨会,形成了一批科研成果,但有关研究仍待深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概念相对宽泛,国内对其内涵和内容阐释不足,对其内部构成体系也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各个学科对话语体系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学科之间缺乏对话和交流。其次,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还没有深入的探讨,也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最后,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概念还缺乏了解,甚至误解。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

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5]。

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时代内涵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中国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由于思想僵化带来不好文风的现象,提倡大家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

2015年5月,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他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创刊30年为起点,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2016年5月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根据话语的定义和话语体系这一概念的产生背景,本研究把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界定为作为话语主体的中国在讲述自己故事时采取的话语模式、话语风格和话语结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征,蕴含了特定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实践,是在国内、国际层面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国家身份、建构话语权的意义实践。因此,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表征,同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和符号资源。

以上有关中国特色话语体的界定蕴含了三个维度。一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涵。任何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话语表达对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传播具有不同的作用(张国祚)。徐崇温指出:

所谓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就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问题的各个方面发表的一系列观点,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关于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4-5)

陈世锋和刘新庚认为:

中国话语、中国模式、学术话语、话语权等概念,虽难以清晰准确地定义,但首先应对其基本内涵和相互的结构关系做一个清楚描述。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话语权的竞争,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竞争,所以话语或话语权是一种综合体,并常以某种模式统而称之加以命名。(5)

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话语表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本质,归根到底是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则是中国国家民族身份话语建构与表达方式的问题。就话语自身的特点来说,不同民族由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种种因素的差异,会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在对外互动中没能注意到不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方式”的区别,就不能产生与目的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名照在2016年4月举行的首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论坛上指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声音能否传得开、形象能否树得起、影响能否打得出来,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听得信。”^[6]

第三个维度则涉及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国当下的实践一旦以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形成社会现实的一种建构。因此,话语体系是一种建构现实、影响社会的力量。文化理论家埃德加(A. Edgar)等人指出,

由于各种社会实践和机构(如政治、教育、宗教和法律)既是由话语形式组成,

同时也是话语形式之内的东西,因而话语就成为了在社会语境之中意义产生和组成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构成了一种论述的建构,即话语是用语言系统构建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能指方式,因而也构成了知识样式。(Edgar and Sedgwick 117)

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一)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认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主题,由一系列关于中国实践的陈述构成的结构性整体。中国特色话语实践在陈述总结中国当下实践的同时,也是建构国家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根据我党近年来提出的中国特色话语的内容,结合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时代内涵,“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基本可以提炼出以下九个专题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人民话语、小康社会话语、和平发展话语、负责任大国话语、民族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一带一路”话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话语。由于话语本身的社会属性,以上九个话语专题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影响、有所交叉的。虽然不能穷尽中国当下所有的话语实践,但基本涵盖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依据话语主体的不同,以上专题话语又可分为四类意义实践:(1)国家领导人有关某一专题的论述;(2)国内主流媒体对某一专题的话语实践;(3)民间智库、学界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研究;(4)普通民众利用社交媒体对某一专题的表述实践。

根据以上九个专题和四种意义实践,同时考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三个维度,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课题可分为三个研究问题,其中包括:(1)中国特色话语实践中的国家身份的建构策略;(2)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历程、内容、路径、模式,以及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世界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3)中国特色话语传播实践研究。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家身份的建构策略主要回答在中国特色话语实践中,话语主体或是客体身份建构的话语策略,即话语实践在形塑国家民族身份时的话语策略、运作机制和建构模式。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历程、内容、路径、模式,以及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世界同类话语的逻辑关系等内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传播实践研究具体考察中国话语传播实践过程中的路径与模式,提出优化话语传播效果的对策和建议。在以上的研究内容中,国家身份的建构策略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话语建构与对外传播实践是该研究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中国特色话语建构侧重话语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话语传播则侧重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互动形态与机制。

（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的主要方法

话语研究的有关方法构成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人们开始思考一切存在的合法性。在此思潮下的话语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社会学家或批评学家对话语的界定受到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即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关系密切相关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分析学派在借鉴以上观点的基础上,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话语做了界定。他们认为,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成份中的一种构型,其中包括劳动形式、身份确认和对现实世界的呈现三个部分。在某一社会实践所包含的物质元素、社会元素、文化/心理元素,以及话语这四个范畴中,那些进入到社会实践的元素被称为社会实践的环节,话语与社会实践中其他环节进而构成了一种辩证实现关系,即话语在受到社会实践其他环节制约、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建构着其他环节。福柯有关话语的论述可以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律性,且具有共同的连贯和力量。其次,话语分析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由于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专家学者开始观察某一社会实践中的话语生产、流转和消费过程,进而试图明晰地描述这一实践过程。这一研究趋势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话语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最后,中国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本是具体的分析对象。文本是话语实践的痕迹,是话语的“凝固体”,文本又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变化的“晴雨表”,文本同时也是寻求社会互动和变迁以及身份磋商的重要的可观测到的标示之一。对中国实践所产生的文本的深入解读,能帮助揭示我国与世界在互动过程中的身份建构与磋商过程。

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资源

首先,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源泉。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程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丰富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源泉。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家国天下情怀、独特的“形”与“意”辩证结合的汉字语言体系特点、三教合一的世界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的理念都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涵。中国文化在实践中的灵活变通、和谐与共、成己达人的处事风格也因此成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素材。《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无疑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一种道义的基础。当今时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长河和近3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大增强了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无疑也大大丰富了我們与世界沟通的内容。

其次,中国当下的实践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素材。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崛

起,中国在亚洲充当着经济领袖的角色,在世界上也独树一帜。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先后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16年G20峰会、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等国际大型会议和赛事在中国举办。这些成就无疑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素材。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中国现代化的成就构成了中国话语实践的内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当下的实践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例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由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去解读、解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任务。

再次,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话语实践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不仅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建构国家形象,夺取和维持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同时,良好的话语体系也是实现国内、国际沟通的重要渠道。国家的话语体系是整个国家声誉的一部分,也是国家间互动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也意味着国家话语体系的完善与成熟。只有中国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能融通中外、融入世界的话语体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

要形成研究合力,积极推动话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近年来,随着话语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许多研究机构、部门或是高等学校都成立了话语体系研究中心或是类似的研究机构,有关话语体系的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也越来越多。由于话语体系建设涉及因素众多,相关研究往往散落在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当中,各研究机构也由于其所在环境与所受任务的不同,很难形成有体系的、有系统的研究。二战后,出于对外拓展和沟通的需要,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并发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拓展和推广。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努力形成研究合力,积极推动话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培养既熟悉西方文化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话语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人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具体话语实践,推进语言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国在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部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实践后,确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理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话语实践,关注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当下的话语研究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植于中国文化,致力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传播,凸显大国责任和国人的感召力。

正如习近平同志提到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7]。“一带一路”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与重构研究、“中国梦”与话语体系建设、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话语模式、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模式等具有现实关照意义的课题都是具有时代气息的有关话语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经典案例的研究,我们可以凝练理论,指导实践,进而提升国家形象,建构话语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最终实践目标是提升个人、机构、国家层面的跨文化话语能力。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等各方面协同努力,要增强国家、机构和个人的话语意识,及其话语与跨文化沟通能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仅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更应该是凝聚国内外各种建设力量的伟大社会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国家话语实践的风格、角度、关注问题等都构成了影响国家形象、国家声誉以及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因素。例如,我国擅长的集体行为、国家宏大叙事往往忽视了个体的需要和感情,而这些理念与西方以个人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又有所差异。我们在凸显国家意志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个人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要求。在集体主义的理念下,个人的牺牲往往是集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会得到赞扬和支持,然而西方文化对于这种故事却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承办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是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是全世界的一件盛事、大事,而西方却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他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国家行为,举办此类活动影响到了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所以,解决这种差异,进行有针对性地跨文化沟通,提升国家话语表达能力,在当前就变得更加紧迫了。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8]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中国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有关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主要内容与方法、建构资源和路径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所蕴含的三个维度。根据这三个维度,结合当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具体内容,提炼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包含九类专题话语。从研究主体划分又可分为四类意义实践。本文提出,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植于丰富的中国文化宝库,立足于当下的具体实践,重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跨文化传播为桥梁,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培养兼具话语研究与跨文化

传播能力的人才,密切联系当代中国具体的话语实践,以提升国家、机构、个人层面的跨文化话语能力为目标。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经不再是观众,而是“由进到近”,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实践层面,中国需要对目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所取得的成绩进行新的阐释。因此,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实践,是在国内、国际层面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意义实践。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时,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也就成为了我国社会实践的必然。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上,我们既要研究西方的问题,更要注重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尽管对当代中国的核心理论一时还难以概括出来,但基本上可以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来进行^[9]。中国特色话语建设恰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探索,目的在于提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新思想。

注释 [Notes]

[1] 参见 S. Mills. *Discourse*. Routledge, 2003.

[2] 参见 M. Wetherell and J. Potter. *Mapping the Language of Racism: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Exploitation*. Columbia UP, 1992;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Feminism and Discours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Sage, 1995.

[3] 参见 P. Berger and T.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oubleday & Company, 1966; D. C. Martin. “The Choices of Identity.” *Social Identities*, no. 1, 1995, pp. 5-16; 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Blackwell, 1996; N. Fairclough.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Routledge, 2003; V. Burr. *Social Constructionism*. Routledge, 2003; N. A. Andersen. *Discursive Analytical Strategies*. Policy, 2003; R. Wodak, et al.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inburgh UP, 2009; T.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UP, 2014; R. Chaliganti and U. Müller. “Policy Discourses and Environmental Rationalities Underpinning India’s Biofuel Programm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no. 1, 2016, pp. 16-28.

[4] 参见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钱敏汝:《戴伊克的话语宏观结构论》,载《当代语言学》(原名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2期,第87-94页;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第16-44页;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苗兴伟:《“话语转向”时代的语篇分析》,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4年第4期,第64-71页;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新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施旭:《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31-40页;谢立中:《后社会学或多元话语分析:社会研究模式新探索》,载《社会理论学报》2015年第18卷第1期,第3-32页;钱毓芳:《语料库与批判话语分析》,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198-202页;窦卫霖:《中美官方话语的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陈新仁:《语用身份: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载《外语研究》2013年第4期,第27-32页;孙吉胜:《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尤泽顺:《话语、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人民日报〉与〈海峡时报〉新闻标题对比分析》,载《话语研究论丛》2015年第1辑,第60-72页;田海龙:《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田海龙、赵芃:《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与社会关系》,载《当代语言学》2017年第4期,第494-506页。

[5] 见新华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6] 见新华社:《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论坛——战略与路径: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2016年4月7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zhibo2/gdzk/index.htm.
- [7] 见新华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8] 见新华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9] 见韩庆祥、陈元章:《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载《光明日报》2017年05月16日第15版。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utler, J., et al.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Translated by Daping Hu, et al.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04. [巴特勒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Chen, Shifeng, and Xingeng Liu.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International Pattern and China's Position." *Huxiang Forum*, no. 4, 2014, pp. 5-11. [陈世锋、刘新庚:《全球话语体系:国际格局与中国方位》,载《湖湘论坛》2014年第4期,第5-11页。]
- Edgar, A., and P. Sedgwick.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 Routledge, 1999.
- Epstein, C. *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MIT, 2008.
- Howarth, D., and Y. Stavrakakis. Introducing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Identities, Hegemonies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D. Howarth, et al., Manchester UP, 2000, pp. 1-23.
- Laclau, E.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1990.
- Laclau, E.,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2001.
- Tian, Hailong. "The Ground of New Rhetoric and the Ris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mporary Rhetoric*, no. 4, 2015, pp. 32-40. [田海龙:《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载《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4期,第32-40页。]
- Xu, Chongwen. "Persisting in Perfe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Model." *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 3, 2011, pp. 4-11. [徐崇温:《坚持完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第4-11页。]
- Zhang, Guozuo. "How to Build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People's Daily*, 11 July 2012. [张国祚:《中国话语体系应如何打造》,载《人民日报》2012年7月11日。]

◇责任编辑:吴晋先